

#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8年1月29日

总第29期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1



3



4

## 古籍修复 从传承到推广

□ 本报记者 刘晓立

古籍修复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国家及社会都对古籍修复事业给予了很大支持与关注。为进一步加强全国古籍修复工作，2009年，文化部在国家图书馆等12家具备较好修复工作条件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设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多年来，以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为代表的各级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等藏书机构在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修复实践、课题研究及宣传推广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举办多期修复培训班；探索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的带领下成立各地传习所；积极投入修复材料的科研工作；举办各类修复专题展览、体验活动等。此外，民间修复机构也为古籍新生贡献着一份力量。

本期，让我们走进几家有代表性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多方面了解“古籍修复”这门技艺，同时了解现阶段修复工作的难点及重点。

1

### 南京图书馆：多岗多人频结硕果

南京图书馆2009年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14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2015年获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2015年再度入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修复中心现有面积10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古籍专业修复室之一。根据古籍修复工作特点，整个区域科学划分为修复工作间、专用纸库、设备实验区、展示交流培训区等四大功能区。各种配套的修复设备、

纸张检测设备、修复材料和工具较为齐备。修复中心紧邻馆藏古籍书库，方便提取待修古籍及归还已修古籍，最大程度地保证古籍出入库的安全。修复中心现有专职修复人员16名，以老带新，年龄结构合理，也是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古籍修复岗位最多的单位之一。

历史文献修复中心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年古籍修复量2万余叶，还启动了馆藏珍贵古籍修复计划，以珍贵文献修复项目，带动古籍修复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此外，该中心积极开展纸张实验有关

科研；对全省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业务指导；推进古籍修复外包工作，让民间的专业公司参与古籍修复工作；继续与莫愁中等专业学校、金陵科技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联合办学；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举办古籍修复专业技术培训班，持续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并延伸与莫愁中等专业学校的合作，推行古籍修复劳务人员派遣。同时，大力开展古籍保护与古籍修复宣传，举办各类专题展览、修复专题活动，通过多种方式“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 山东省图书馆：创新制度开创先河

山东省图书馆是全国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12家“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之一、2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之一。

现修复中心有青年修复师8人，外聘专家2人。2008年底，特聘全国知名修复专家潘美娣女士及山东省档案馆从事修复工作28年的邱悦玲女士从事古籍善本修复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工作。2010年7月，修复中心的7名青年修复人员正式拜潘美娣为师，2011年11月，传习所挂牌成立。除手把手传习之外，修复人员共

参加国家级各类修复培训及学术、实践交流活动近30期（次）。

2010年至今，该中心共运作了5项修复项目。尤其是2010年启动的宋刻本《文选》修复重点项目，运用项目管理的理念，引入专家论证会制度，建立试修本制度，预做装帧形式，建立完备的修复档案，以科学检测为依据，建立科学报告制度，实现七大创新，开创了国内进行科学管理修复一级古籍的先河，成为国家古籍修复的经典案例，在全国推广。

2011年，山东省图书馆打造了“册府琳琅”展厅，定期举办

珍贵古籍特展。古籍修复人员在展览现场进行修复技艺展示及各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2016年，在全省启动“古籍修复站点网络建设”，目前已完成第一批修复站点的申报、评选、挂牌，并开展修复工作。自2012年起，修复中心共承办国家级古籍修复培训班3次，并于2016年启动“山东省古籍修复初级导师初级学员培训计划”，由6位青年修复师作为初级导师，对首批山东省内11家古保单位的11位初级学员进行培训。培训期为3年。2017年已完成两期一个月的培训。

3

### 天一阁博物馆：一个品牌连接内外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拥有一支以古籍修复技术和纸质类文物科技保护等多学科复合交叉的专业人才团队，包括专业修复人员10人、文物科技保护人员3名，其中，高级职称1名、中职职称3名（又其中：博士1名，硕士2名）。

中心总面积470平方米，由传统修复工作室和科学实验室组成，拥有专用的古籍文物消杀间和手工

纸纸库，2009年分别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称号和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纸质类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古籍修复数量连续十年占浙江省前列，在完成天一阁馆藏“双璧”明代科举录和地方志修复工作的同时，还对部分馆藏珍品进行了修复保护，如明乌格抄本《天圣令》《夜航船》及明刻本《西都杂例》等。该中心还对外承接纸质修复项目，进一步打响了

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的品牌影响力。

此外，作为浙江省非遗项目传承基地和宁波市科普基地，天一阁博物馆古籍修复中心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寓教于乐的“大美·古籍”系列活动十余场，融合非遗技艺和古籍文化，影响深远。2016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7年，天一阁古籍修复师王金玉获评省级非遗传承人。

4

### 上海图书馆：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为2009年全国首批挂牌成立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多年来专注于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现有专职修复人员10人，拥有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称号2人。历年来完成大量各类珍贵古籍文献修复任务，包括民国文献、西文文献、书画碑帖等。古籍修复累计总量达到19733册1095543叶，约占全国古籍修复总量十分之一

以上。所有修复工作皆本着“抢救性修复”“整旧如旧”的原则，力求保证文物安全，延长古籍的收藏时间。

为延续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上海图书馆作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多年来定期举办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为上海地区的青年古籍修复人员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同时多次举办面向全国修复人员的修复研

修班，上海图书馆导师赴各省馆协助建立古籍修复中心，提供教学师资力量支援。

在古籍修复技术的基础科研方面，上海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引进纸浆修复机、显微纸张纤维分析仪、色相分析仪等设备，学习借鉴世界先进修复科研成果。并为解决古籍虫害难题，自主研发防霉纸系列产品，被国内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运用。

# 妙手刘建明： 在重复中探索， 在枯燥中打磨

□ 本报记者 刘晓立

18岁学修复，拥有近40年的修复经历，参与完成了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样式雷等多个重大文献修复项目；把手里的每一片纸都看作珍宝，首创“挖镶法”保存残片，2016年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在一遍遍看似“重复枯燥”的工序中，打磨着“工匠精神”。他就是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刘建明。

30多年前，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18岁的刘建明就已经开始跟着师傅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了。

“我是9月到馆，11月就被安排跟着张士达老先生学习古籍修复。刚开始对古籍修复一点概念都没有，觉得好像就是修修补补的，像个裱糊匠，可是真干起来，知道自己手底下的是珍贵文物，跟粘补其他东西时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刘建明记得，那时候正是爱玩的年纪，一坐下就像凳子上有根针似的，老想动一动，完全无法静下心来。后来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一本破破烂烂的书通过自己的手变得整齐，有了一种成就感，慢慢就喜欢上了，而且越来越觉得有意思。

回想起这些事，刘建明最大的感慨就是：人只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能静下心来。“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会儿就好多了，现在每年都有一到两个大学毕业生到国图修复组工作，他们来之前就知道古籍修复是怎么回事，而且本身也喜欢，所以一般来说，都能坐得住。”

## 修复需长久实践， 不是短期培训能做到的

近些年，古籍修复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和了解，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参与。而国家图书馆与地方各级公藏机构，也举办了很多古籍修复类培训班，培养了很多修复人才。在刘建明看来，这是一种进步，但远远还未能达到人才培养的要求。回想起自己的从业经历，刘建明觉得正是跟着师傅的那段时间，慢慢形成了一套正确的操作办法，以及对这项工作更深入的正确认识。

张士达老先生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后来虽被请到北京图书馆，但因为家人都在南昌，在带领包括刘建明在内的三人学了一年修复后，就又回到了南昌。“为了真正掌握古籍修复的技巧，当时我们还跟着师傅去南昌学了一年，经过这两年的学习，在长时间的动手操作中慢慢积累经验，才能熟练，能放心地独立进行操作。”刘建明说，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长时间跟着师傅实践，能够比较系统地学习师傅的理论和技巧，而培训班的模式长的两三个月，短的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学的就是一片皮毛，回去就不知道怎么干了。“领导不知道他们学的程度，也不敢让他们放心上手实践，这样越不做就越不知道怎么做，也就又生疏了。”正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培训班这种模式的缺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2014年起积极探索以国家古籍保护人

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为依托，加大与高校合作力度，建立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在全国设立了20余家传习所，以师带徒的形式，培养古籍保护修复骨干人才。

## 枯燥工序， 打磨“工匠精神”

古籍修复师的工作，就是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古籍修复就是给古籍治病，让古籍重新焕发光彩。”刘建明说。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三十多个春秋里，刘建明参与完成了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样式雷等多个重大古籍文献修复项目。

“这本书被虫子从上咬到下，补了纸，就变高了，这时候就要捶一下。”刘建明一边介绍，一边顺手拿起喷壶，朝一本已补接好的书封喷水，用两块大理石压书板压在上面：“压上两三天，就平整了。”喷水压平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其实很有讲究。“应该用多大劲儿，喷出的水是雾状还是水珠状，为什么喷在衬纸上而不是书页上，这都是需要经验的，都会直接影响到书页的平整效果。”刘建明说。

一本古籍的修复，需要哪些程序？“建档，做修复方案，配纸，补洞，喷水压平，折页，捶平，上压力压平，齐栏，最后是装订……这个过程中，相对比较有难度的就是齐栏。古籍都有一个书框，有天头地脚，一般情况下，想要弄齐首先要把口墩齐，有些书页大小不一样，那就要把地脚的书框弄齐，这个比较考验功力，有时候你把口对齐了，栏就不齐了，栏齐了口又不齐了，都是一些需要经验技巧的活儿。”刘建明说，每一部书从拿到手到修复完成，都要经过这十几道工序。“甭管哪个年代的书籍，其分类可能不一样，但对于修补的步骤却都是一样的。”也正是这一遍遍看似“重复枯燥”的工序，才打磨出了修复者的“工匠精神”。

刘建明在2016年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在他看来，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只有在认真工作中能干出成绩来的人，才能算得上具备工匠精神。在几十年的修复经历中，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在西夏文献的修复中，首创“挖镶法”进行残片的保存。“西夏文也是方块字，看着好像都认识，其实哪个字都不认识。事实上，全国懂西夏文的人加起来也就十来个，所以在修复中，大片的修复完成后，剩下的残片就需要先集中起来存放，等专家过来，辨别清楚才会进行

复位粘贴。”刘建明介绍说，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比如修敦煌遗书的时候，是把残片集中到一个文件袋里，但这样处理既占地方还不好看，所以在做西夏文献修复的时候，他想了个办法：根据残片大小，先在线装书的书页中“挖”出相应区域，再把残片“镶”进去，这样保证了书页的基本平整，不会像粘贴剪报一样凹凸不平，而且美观又便于翻阅。

## 集中精力、耐住性子， 才会有成果

古籍修复不是个轻松的活儿，长时间的伏案细致工作，对于颈椎是很大的损伤；注意力高度集中地盯着一个小地方，眼睛也极度容易疲劳；此外，书籍发霉絮状以后，一旦拆开就会有纤维散发出来，肉眼看不到，可是进入口鼻是极为难受的……所以，对于修复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有正确认识。“修复师就是古籍医生，医生给人治病，我们则是给书治病，通过自己的手把书修好了，那就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刘建明说，现在国家对保护和修复非常重视，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具设施都尽量做到最好，这种伤害也就减少了很多。“以前做修复就是拿个碗、拿根笔，补书的时候有那种小眼，放桌子上看不见，得拿起来对着灯光或日光才能看到，现在有了透光板，把灯一开，直接就能看见，很是简便。”

除此之外，修复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材料，比如糨糊，以前都是修复师自己洗，“要先去掉面筋，只剩下粉子，再拿水冲一下”，现在已经有了现成的粉子，“这样一来就节省了一些程序，提高了效率”。刘建明说：“补纸也是这样，以前我们留了一些老纸，但肯定是越用越少的，现在就是使用一些厂家做旧的纸，他们会使用一些矿物质颜料进行染纸，尽力保持颜色上的匹配，还能保持长时间不褪色。”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古籍修复条件已有很大改善，很多过程变得简单，但唯一没有变的就：要做好古籍修复，就要有耐心，能够坐得住。“做古籍修复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静不下心来，十分钟起来一次，这活儿就干不好。”刘建明开玩笑说，“古籍修复者虽然都是好性子，但每天跟古纸打交道的并不代表是老古板，工作中能静下来，生活中能玩起来，才有意思。”刘建明平时喜欢钓鱼，这可以说是更能练性子的活动，用他的话来说，刚开始是鱼钓人，后来才是人钓鱼，“就跟修复一样，耐住性子才会有成果”。



## 古艺山房：口碑是最真实的品牌

□本报记者 刘晓立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以及民间古籍收藏队伍的发展壮大，面对『千金难求』的市场需求，民间古籍修复力量渐渐浮出水面。但在积极投入的背后，民间古籍修复企业也面临着市场准入、人才招聘、材料搜集等一系列难题。本期，记者采访了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范晓瑜，借此了解民间古籍修复行业的市场生态，了解这支古籍修复的新生力量。

## 1 民间修复：服务公私藏 满足个性化需求

从2005年至今，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做古籍修复已经有十几年了，负责人范晓瑜是艺术设计专业出身。受亲戚的影响，他很早就接触并喜欢上了古籍收藏和修复。一开始，他在太原理工大学美术学院的古典艺术研究中心做教学与古籍修复工作。“大概是2004年，当时的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门的李东溟先生到山西征集拍品，关注到我们的修复工作，觉得修得不错，就建议我们到北京做这项工作。因为当时北京市文物局有不少古籍都是送到沈阳和上海修，每次运输的安全问题都是个麻烦事儿，所以想从北京找一家专业的修复公司。”得知这个情况后，范晓瑜当年就在北京购置办公场地，并于2005年初成立了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古艺山房不光为藏书家服务，也为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众多公藏机构修书，在业内有口皆碑。“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公藏机构，这些机构对修复程序和质量上都有更严格的把

关，所以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认真地越做越好，才能一直做下去。”范晓瑜说，用态度和技巧积累起来的口碑，对于民间修复公司来说才是最真实的品牌。

“私人藏书家和公藏机构对于修复的要求有时候是不一样的。”范晓瑜说，古艺山房作为民间修复机构，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来设计修复方案，比如公藏机构一般要求恢复原状，“修旧如旧”是他们遵循的原则。而私人藏家除了有恢复最初面貌的要求外，还会因为个人审美或者使用上的一些偏好，要求做一些修饰，“比如，如果书籍的开本大小，给人感觉很局促或者影响阅读，我们就会在藏家同意的基础上，做一个金镶玉（古籍修复者在古籍进行修复时，根据古籍的现状和破损情况，而采取的一种装帧形式）；如果书籍太薄，翻阅不方便，就会加衬纸，让它厚一点。这些都是有的”。尽管在进行古籍修复时，所坚持的一项最重要原则就是“整旧如旧”，但在具体的修复过程中，还会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根据古籍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和修复手段，一方面使得原书能延长寿命、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满足书主人的个性化要求。

除了古籍之外，古艺山房还有针对其他纸质文物修复的相关部门，每个人都有具体的主攻方向。比如古籍分线装、经折、特装（包括蝴蝶装、包背装等），书画则分卷轴、册页、碑帖等，术业有专攻，争取让手下的每部作品都得到专业的修复。

十几年来，古艺山房每年最少要做三四套宋元古籍的修复，但无论这些古籍价值几何，收费都是依据国家图书馆制定的残损定级标准，和实际操作的难易程度，按照页码定价。“比如，即使是同一年代同一地方的古籍，也可能纸张有所差别，那找补纸的难易程度就会不同，另外，残损程度不同，修补所用的时间也就不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价。总的来说，有一个大标准，但是具体到每一部书，还是要具体来定的，主要还要看修复人员所付出的劳动。”

## 2 现状：民间机构做修复面临门槛高难题

“这些年，国家充分意识到古籍保护修复的重要性，在国家规划及政策制定上都有所倾斜，但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公藏机构的修复经费反而有所下降，以前一个馆的修复经费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现在好像也就一二十万吧。”谈到这些年民间修复公司的生存状况，范晓瑜说。这几年北京房价疯涨，在北京生存成本急剧上升，人才流失加剧，这也造成了公司在北京经营的困难，古艺山房目前只有十几个修复人员。“我们现在把大部分的人员和工作放到了山西基地，北京只负责处理一些难度较高、

工艺较复杂的工作。”

“除此之外，现在公藏机构对修复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修复机构需要参加竞标才能拿到修复项目。对于参加投标的公司，也有一系列的标准要求，比如修复场地、机器、修复人员资质等。”范晓瑜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正规化是应该的，可按照现在的要求和标准，估计就只有国家图书馆能做了。”如今，大量珍贵古籍文献都在公藏机构收藏，在修复、整理等方面自然需要一个标准，可若对各类修复机构都执行这些标准，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范晓瑜说：“公

藏机构从业者可以评职称，可对于民间从业者来说，有什么渠道可以参评呢？当然我觉得实际上也没必要，古籍修复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个传承的事业，过多设置门槛，反而会使得行业‘水更深了’。”对于民间古籍修复来说，也许遵循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更为合理，用范晓瑜的话来说，口碑才是最真实的。

“把东西做坏了，你也许能蒙一个人、两个人，但是蒙不了八个人、十个人，自然很快就会从行业里被驱逐出去。所以，有什么样的资质都不如做好每一次修复。”

## 3 问题：人才和材料“难找”

一边是外界准入制度，一边又面临着人才难求、材料难找的难题，范晓瑜表示，真正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耐心的人难招，而招来的人能不能满足对方对职业的期许也是令他头疼的一个问题。“其实古籍修复是一个挺辛苦的工作，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伏案工作的细致活儿，就按正常的八小时工作制，每天做完都是腰酸背疼，眼睛难受，比较辛苦；但在相应的劳动报酬上却没办法达到年轻人的预期。”范晓瑜介绍说，在北京，一般来说，如此强度的工作，年轻人对月薪的期许可能在一万五到两万元，可按目前的修复收费标准，肯定是达不到的。“举个例子，一个有五年经验的修复师，按照中等破损程度的古籍来说，一个月也就做300页左右，

要达到月薪一万五，一页就得收到50元，这才能供给如此水准的工资部分，可除了工资外，还要有材料、场地、管理等其他费用，那至少需要再上浮30%，每页加15到20元钱，也就是每页70元……这个价格是市场完全没办法承受的，实际上能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才是现实的情况。”

以前，公藏机构的修复人员走的都是工人岗位，没有职称一说，自然在待遇上就差了很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呼吁，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存在了。可是对民间修复人员来说，压力依然很大，报酬远远跟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后来我们转变策略，都是招一些成过家的，毕竟他们生活需要稳定；还把一些普通的修复工作放到了山西，大家都需要生活，

不能说一辈子在北京租房子，或者在公司住宿舍，这都不现实。”

除人才难招之外，材料也是一个古籍修复工作中的“拦路虎”。比如，古籍用纸很复杂，有些可能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纸，“有时候你把存的所有老纸新纸都翻一遍，还是没有合适的，那只能全国各地去找”。范晓瑜举例说，古艺山房今年做了一部西夏文古籍的修复，总共也就十来页，但仅仅找补纸就反反复复找了将近四个月，每次找到了觉得差不多，回来一比发现还是不行。这部古籍所用的是西夏当地的一种纸，比较粗糙，加上经年日久，纸的纤维已经掉得差不多只剩下骨架了。“修的时候，一张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范晓瑜说。

## 4 从业者：要有一颗仁者之心和爱美之心

作为一个修复工作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对此范晓瑜别有见解。他说：“修复者首先要有一颗仁者之心，要像医生一样，看到病人起码有一份怜悯；然后要能静下心来，望闻问切，得把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最后还要掌握熟练技巧，能够制定合适的修复方案，采用合理的修复方法，来把这个‘病人’调理好。”除此之外，在范晓瑜看来，古籍修复不仅仅是一个手艺活儿，它还是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所以有一颗

爱美之心也很重要。“我是学设计的，家里也算美术世家，所以会从艺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比如说颜色的配置。可能对于大部分修复者来说，技法上没问题，找一个差不多的纸补上就好了，但在在我看来，那就像一件漂亮的衣服，原本是蓝色的，却在一个小洞上打了个浅蓝色的补丁，完全破坏了整体的和谐感，所以我要找与原书很相近的纹理、颜色，更有效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古艺山房的修复人员大多毕业于太

原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对于人才的选择，范晓瑜说，一方面要看他们能不能静下心来，另一方面需要他们有一点美术基础，而具体的修复技巧还是次要的，这可以后期培养。“其实，所有人员进来以后，都要经过三年左右的培养，才能让他独立完成修复工作。即使是修复专业的毕业生，在修复理念和技法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培养。”对范晓瑜来说，民间古籍修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加入，这也是他新一年的期盼。

# 墨汁的纸上行旅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宋鑫

近年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工作期间，我除参与多项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项目外，还与“石头图书”有了一点接触。从馆藏的碑碣刻石，到野外山林深处的摩崖与洞窟，于我而言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和历练。

文献的载体形式众多，在没有纸张以前，石板封泥、陶器砖瓦、钟鼎甲骨、简牍缣帛，还有植物茎叶以及动物皮层等都被作为书写材料。这些文献载体受限于自身条件，多数不方便携带和传阅。造纸术发明与推广后，纸张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在不断的改进中，也推动了书法与绘画的发展；而墨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也使得传拓获得了重要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纸质文献的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

传拓是指用纸和墨将铸、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或图案拓印到纸张上的技术，根据传拓对象、拓印材料、拓印技法、着色效果等又有多种分类，传拓技法难易有别，拓片效果各异，如有乌金拓、蜡墨拓、蝉翼拓、彩拓、全形拓等。传拓的成品称为拓片，拓片通过修裱装帧成册即为拓本，或称打本、脱本、蜕本等。石刻文物是我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保护也一直以来面临着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严峻考验。

巴蜀地区的石刻文化遗产丰富，但“蜀道难”，一些“石头图书”多年来一直被隐匿在人们难以寻踪的位置。2016年3月，我与同事一行五人应邀参与达州市文化帮扶项目，项目要求对万源市石窝乡古社坪村的一处野外摩崖石刻文物进行拓印工作，该石刻曾在1991年获批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带着宣纸、墨汁、喷水壶、毛巾等大包小包的工具有材料，经过数小时的高铁与半日颠簸蜿蜒的汽车旅程后，再徒步穿过一大片田埂和杂草丛林，几经辗转，才抵达了目的地。那一刻觉得兴奋又疑惑：这里曾经是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谁在这里留下了文字？又是谁发现了这里？寻宝似的充满好奇和激情。

岩刻内容距地面约4米高，岩体面前几米外砌有一座用于观瞻的水泥楼台，当地工作人员提前为拓印工作搭好了用树干和木板支撑的简易支架。当我颤巍巍地爬上架子近距离看到和触摸到岩石崖壁上的文字时，一种敬畏之感油然而生。

这处摩崖石刻题名《紫云坪植茗灵园记》，刻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记述了王雅、王敏父子于

北宋元符二年（1099）从福建引进茶树种植的史实。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保存最好的记述种茶历史活动的岩刻。全文以阴刻自右向左竖行行文，标题为隶书、正文为楷书，石刻幅长近2.5米，宽约1米，虽有岩石本身的纹路和斑驳风霜的石质表面，但崖壁本体状况良好、字字清晰可见，能够感受到原作的笔力遒健与精湛刻工。古人对此刻石的选址也颇有讲究，石刻文字的上方有一块伸出头的岩石，就好像屋檐一样为它遮风避雨，使它历经了九百多年都能保持完好。

我们测量好幅面尺寸后将纸张裁好润湿，并把岩石表面的灰尘泥土稍事清理，在空中木架上先来回踱几步，试试怎么站才方便操作。脚下的木板条间有手掌宽的间隔且有坡度，由不得手上拎太多东西，上纸时三四人一齐上阵，拎纸、刷纸、递毛巾等都要配合好，必要时嘴巴帮忙叨下棕刷。整个上纸过程需要又快又好的让纸张先附着固定，再一遍遍排实、刷出口口。从手臂至指尖的控制刚柔并济，腿的姿势也是变换着的，肌肉持续紧张状态下，我的腿会在换步时偶尔哆嗦一下，刷纸和拓印的动作强度太大后也会觉得酸疼。但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时间上耽误不起，因为对于野外碑碣刻石的拓印需要更多的考虑自然因素，诸如交通、天气、地势等，制作拓片的过程也往往需要不少时间。

制作幅面较大的拓片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且不说物体是在什么样的位置、环境，是平面为主还是浮雕造像，光是它够大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制作起来筋疲力竭。去年，在应邀前往广元市苍溪县参与清代洞藏摩崖书法石刻“寻乐书岩”的文物拓印工作时，有一幅8.8米长、2.2米高，共2160多字的书法石刻，我们一行四人在本地两位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花了大半天时间才一起完成了这件巨幅的拓制，上纸、刷纸、拓印、揭取，每一步都比拓印小物体要繁复很多，对我们的体力也是一大考验。不禁感叹古人之精神，如何在那个时代做到这样大工程的劳动！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表达，那真是要为他们“打call”！

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极盛于东汉，下及各代。不同时期所拓制的拓片都将是历史画面的一帧，如果历史能够倒带，那墨与纸融合的技艺便是最接近真实的影像，而每一位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者都将赋予其不凡的生命力。



2013年，我参与了一套《豫变纪略》的修复工作，该套古籍破损情况比较严重，针对其开展的修复工作也较为复杂繁琐，从制定修复方案到最终装订成册耗时四个多月。

## 前期：认定破损等级

《豫变纪略》共一函四册，明末郑廉著，史部，是记录明末流寇事迹的重要史籍。此套书为清刊本，收藏于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古籍部。书籍尺寸为：长25.8厘米，宽16.8厘米，每册页数在70页左右，内页为竹纸，酸化泛黄，书皮为宣纸，上面有墨笔题书名。

由于以往保存不当，文献的虫蛀情况非常严重，穿透性的蛀洞在整套书上已连成片，粗略估算，虫蛀面积约占全书的70%—80%，书口全部开裂，有的部分甚至轻微翻

补好后，还要从最初扫书时掉下的纸张里查找有没有脱落的地方，将脱落的部分粘上，纸张上有印字，所以除了注意对齐接口的位置，还要考虑字迹比划的衔接。这些脱落的纸张大部分都是用镊子一点点拼上的，修复速度较之以往慢了许多。

补页完成后，就是喷水压平及捶书。

《豫变纪略》的修复主要在于补页，原书页加上补纸，修补后的书页摞在一起显得有些厚，用手摸上去，明显感到补过的地方凹凸不平，因此还要进行捶打压平。

捶书，是指用平头锤子反复捶打书口和书页上有补纸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让补纸与书页的接口处更加平整，也是修复工序中的重要一环。捶书时一次不能捶太多页，每次摞在一起的书页最好不要超过10页，像这套书修补的地方很多，捶起来更是一个力气活儿，从中间到边角都要反复敲打使其平整。

# 善本《豫变纪略》修复记

□首都图书馆 王岚

页也会导致成片纸张的脱落。书脊内侧还有虫蛀的排泄物等残渣，破损部分粘连。

在与修复组组长及同事们共同协商之后，根据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定级标准，结合这套《豫变纪略》的善本价值，将其定为二级破损，属于重度破损的文献，需要进行抢救性修复。

## 操作前：制定修复方案

古籍产生虫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度与湿度不符合保存条件而造成的。因此，在实行修复之前要先进行低温杀菌处理，将书置于零度以下的环境，彻底杀死内部的虫书及虫卵。

有虫蛀的文献通常也伴随着污渍和粉尘。按照传统修复步骤，应先拆开书页清洗，再做修补，但鉴于这套书的虫蛀面积过大，纸张缺乏韧性，不适宜冲洗，所以改为使用干净潮湿的排刷拂扫书页，去除上面的灰尘，待修补完蛀洞后，再喷水进行深度清洁。

这套书的纸张薄软，大量的蛀洞已造成部分残叶脱落，因此也不考虑使用纸浆补书机，而是全程采用手工补页、喷水压平、加书皮、护页、并重新装订的方法进行修复。

## 修复：拆洗、补页、压平、装订，全手工

具体的修复从拆开书页，清扫污渍，检查墨迹是否溶于水开始。

经过几周的低温冷冻之后，先进行书页的拆分，第一册的破损尤为严重，成片的虫蛀贯穿整册书，需要用针锥和镊子小心地拨开每页蛀洞的接口处，才能将纸张分开，在揭页的过程中，不时有带文字的纸片儿从中脱落。这些掉落的纸张要编好号放在一旁，待修复书页时再贴回去。书页揭开后，使用干净潮湿的排刷轻扫，去除污渍尘土，为下一步的补页做准备。

书皮上的书名是墨笔写的，湿水后证实不会跑墨，可以用水直接清洗。

之后，就是利用透写台进行补页。

一般补页的方法是将补纸覆在书页上，用毛笔蘸水，沿破损痕迹划出需要的补纸范围，再撕下补纸、用浆糊粘上，这种方法能够保证补纸与破损接口的衔接处不会太厚。但这套书的破损范围较大，虫蛀密集且相互穿插，当补纸覆在上面时看到的蛀洞是连成一片的，无法区分边缘。所以要利用透写台来辅助工作，提高了修复的准确性。

书页的破损面积大，因此需要将补纸分成几部分撕下来，再粘贴于蛀洞上。一页

捶平书页后，继续喷水压平。

书页压平后，就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序了——加书皮、装订。

原书皮的纸张材质是仿古宣，随年代久远颜色偏土黄色，质地比起内页更加酸化酥脆，但纸张较厚，上面写有标题，必须予以保留。修复方法：用清水浸泡，洗去覆盖上面的灰尘。与此同时，染了一批与书皮颜色相一致的纸张，用以修补使用，修补破损后，再在背面托一层皮纸作为加固。

装订时书皮与内页之间加衬纸，书衣外再上一层书皮纸，加强对文献的保护作用。

最后修剪边角，缝线装订。

## 思考：坚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

回顾整个修复过程，主要难点在于：虫蛀面积大，书页纸张松散脱落。因此每一页的修补都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撕补纸、溜口，对齐书页纸张。修补完一页几乎需要一个小时以上。传统的手工修复方式下，速度很难提高，但在技术水准和修复质量方面可以更加细致，不会漏补一个地方。

在修复期间，也曾和其他单位的业界同行交换过意见。类似这样残破的书籍，有些修复人员采用全部托裱的方法使其展平，修复速度大大加快。可这样一来，会影响书籍原有的纸张韧性和纸张的文物价值，并不十分可取。

另外还有一些更新颖的修复方法，听中友修复公司的一位老师介绍，他们用纸浆来修补大面积蛀洞。大致的方法是：先将补纸打碎成浆，铺在需要修补的位置，再干燥压平。这有点类似于手工的纸浆补书技法。它的优点是补纸搭口很窄，缩短了捶书的工序，有利于书页的展平。这种修复方式很有创新，但我们只是听闻，未经证实不敢贸然试用。

自古籍修复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各级领导对古籍修复给予了深切关怀，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投入，比起老一辈的修复工作者，我们现在使用的修复工具更加正规标准，也更加多样化，例如利用透写台这样专业的设备，大大提高了修复的工作效率。

但就目前来讲，古籍修复的工作还是多以手工操作为主，传统的技术技法经过很多代人的实践积累，具有稳定性和可逆性，是古籍修复的主要方法之一。面对各种不同情况的破损，如何进行对症下药的救治，仍是我们修复人员需要不断探讨和学习的。